

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双重视角下 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动向研究

宏 结 钟晓欢*

摘 要：本文深入剖析地缘政治、贸易冲突与全球价值链（GVC）重构的内在关联，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的双重视角下考察GVC重构的底层逻辑与演化方向，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制度性冲突已深度嵌入GVC，诸边联合博弈左右GVC重构进程和方向，GVC重构经由投入产出关联放大贸易冲突和大国博弈的负面影响。其次，利益分配失衡加剧GVC选择性“脱钩”“制造业回流”推动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贸易动力模式进入新旧转换通道成为GVC重构的驱动因素，促使GVC开始重构，而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目标、技术性贸易摩擦常态化、公平贸易与价值观贸易盛行则成为GVC加速重构的催化剂。未来，主动需求协同被动应对推动GVC重构愈加泛化、全球价值链非市场变化凸显主权化趋向、自主创新成为GVC攀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中国应贯彻落实创新立国战略，通过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加快推动本土核心技术创新，坚持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加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体系顶层设计，利用好进出口两面市场，与主流国家加强交流。本文扩展了从外部动力视角探究GVC重构的研究内涵，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破解“低端锁定”困境具有政策启示。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大国博弈 贸易冲突 “低端锁定”

* 宏结，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hongjie4746@sina.com；钟晓欢（通讯作者），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电子邮箱：1786069047@qq.com。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BJL06）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一 引言

伴随着全球生产分工网络日益深化,国际分工模式渐趋演变成以“产业内分工”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分工模式(Baldwin等, 2010)^①。世界贸易组织(2019)估计,超过2/3的世界贸易源于GVC交易的贡献。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风险敞口扩大。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冲突愈演愈烈,加之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GVC加速进入重构通道。在此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竞争优势亟待重塑,呈现出新的演进趋势。

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地理位置、制度环境等是GVC扩张初期最主要的驱动力,但随着GVC分工模式的成熟,其不平衡、不平等的发展实质逐渐显现,加之世界政治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原本高度依存、行之有效的GVC运行受阻,大国博弈、贸易冲突等外部性因素对GVC的影响更具紧迫性和全局性,由此成为GVC重构的主要推动力量。反之,GVC重构的方向和趋势又会进一步影响国际竞争格局,关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和世界贸易格局。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加码,价值观贸易日渐盛行,中美贸易冲突激化双边互信赤字矛盾,极大地压缩了GVC重构中两国少有的共识和合作空间(徐奇渊, 2021),其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更为甚之。与此同时,在GVC分工体系之下中间品贸易占比提高,贸易冲突经由投入产出关联产生了不同于传统贸易模式的累积和放大效应(樊海潮和张丽娜, 2018)。对GVC参与者而言,GVC重构被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赋予了负面内涵与悲观预期。未来的供应链更加强调韧性与安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是威胁供应链安全

① 参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和刘志彪(2019)等研究,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等术语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具有一致性,可视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和场合下的灵活使用。从产业的技术经济联系的维度考虑,全球企业间的联系可以等同于全球产业链;从全球价值分配和控制的维度考虑,全球产业链可以等同于全球价值链;从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关系的维度考虑,全球产业链可以等同于全球供应链。

的重要因素。

2019年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习近平主席指出,“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遏制地缘政治风险,缓和贸易冲突成为发展GVC的重要条件。这既是“促进我国产业迈向GVC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理解和把握地缘政治与贸易冲突下GVC的全新变化,是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前提。

GVC重构诉求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显著的不确定性。百年大变局下疫情助长民粹主义情绪,大国博弈愈演愈烈,贸易冲突此起彼伏,其如何与GVC重构相互交织、叠加共振?又将如何改变GVC重构的底层逻辑和运行方向?中国该如何顺应新形势下GVC变动和重塑趋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企业在GVC分工体系中实现地位跃升?这些是需要研究者迫切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理论问题。

二 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从20世纪中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夕,GVC逐渐成为全球主导性贸易和生产模式(刘志彪,2019),GVC相关研究迅速升温,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自2008年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贸易冲突加剧,GVC协作现状受到冲击和挑战,GVC重构趋势愈发显著。后疫情时代,GVC重构正在加速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特征。

目前对于GVC的研究相对成熟,而对GVC重构的研究仍不充分(毛蕴诗,2017),关于GVC重构的定义与内涵,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早期部分研究认为GVC重构是链主国家^①及GVC参与者在GVC活动中进行大

① 通常指位于GVC高端环节,把握着GVC治理权与动议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GVC延伸方向和配置权重的国家。

范围的创新革命或对全链程进行重新配置,表现为价值链分工在横向和纵向上的“伸”与“缩”及网络节点位移(Milberg和Winkler, 2010)。事实上,导致GVC重构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生因素,包括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技术研发与进步、产业革命等;二是外部因素,如世界经济环境和全球政治形势变化等(戴翔, 2020)。但是现有关于GVC重构的概念界定却未体现出外部因素的驱动。因此,GVC重构是内部变革与外部环境综合作用下的全球生产再配置、国际分工再调整的过程。可见,倘若撇开大国博弈和贸易冲突的背景,GVC重构本身的内涵及其影响更具中性意义。具体来说,GVC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跨国公司全球逐利行为和全球分工优化的产物。随着发展和演化,其不平衡不充分的本质逐渐暴露,催生全球基础经济活动与利益分配格局再配置的需求。GVC重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加入了国家主观能动性和强制性介入,远非市场自发演化的结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VC重构趋势显现,疫情叠加中美贸易争端等综合性因素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空间阻隔的加速器(倪红福, 2020)。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与贸易模式的深刻变革,关于GVC重构的动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碎片化国际生产格局之下,要素禀赋改变致使全球垂直分工变动(谭人友等, 2015;何宇等, 2020);二是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重塑GVC;三是处于GVC中低端参与国的GVC攀升加速GVC重构(戴翔和宋婕, 2019;卢潇潇和梁颖, 2020)。总结相关文献发现,以往学界对GVC重构的研究更多以价值链内部为视角展开,主要涉及内生因素对GVC地位以及竞争优势位移的影响(Baldwin和Venables, 2010;Koopman等, 2014;苏庆义和高凌云, 2015;吕越等, 2019)。中美贸易争端意味着在全球价值链中紧密相连的“两强”面临“脱钩”风险。随着疫情全球大流行,GVC断裂,国际生产体系呈现碎片化发展趋势,为GVC重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倪红福, 2020),促使外部性影响因素更具全局性和紧迫性。因此,后疫情时代的GVC重构研究应更加着眼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本文则聚焦地缘政治与贸易冲突对GVC重构的影响。

GVC 重构本质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外在表现是贸易，因此关于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如何影响贸易分工与贸易格局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深厚的研究基础。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及贸易“脱钩”风险成为研究热点，已有文献更多的是关注其对于中美贸易及国际经贸体系的影响（竺彩华和刘让群，2021）。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博弈成为影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关键力量，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则是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保建云和李俊良，2022）。贸易争端是大国发展竞争与政治权力博弈的产物，会在全球范围内激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利益矛盾，加剧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利益分配矛盾和不公平性，冲击全球贸易。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发展，部分研究开始以大国博弈视角分析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及其规则构建。事实上，大国竞争不仅影响国际贸易发展，而且影响贸易的地理空间分布。从宏观层面看，地缘政治风险通过不确定性影响区域贸易合作（张威等，2022）；从微观层面看，面对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倾向于寻找更为安全可靠的贸易伙伴和供应商，从而可能引发贸易分工的调整。部分研究观察到 GVC 与国家政治关系之间的关联，聚焦 GVC 中的结构性权力、国家对外政策趋向及国际格局演变（余南平等，2023），由于结构性权力的外溢效应，数字贸易规则博弈呈现与地缘政治竞争相结合的趋势，推动国际经贸问题政治化（余南平和栾心蔚，2023）。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关于地缘政治对国际能源贸易影响的研究再次掀起热潮。

关于“外部冲击如何影响 GVC”，现有文献的主要发现是：毛蕴诗（2017）认为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竞争加剧和贸易摩擦等作为影响跨国公司外部环境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加速企业转型变革，进而推动 GVC 重构。谭人友等（201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与 GVC 重构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余振等（2018）则指出 GVC 重构对中国所遭遇的贸易摩擦有“催化剂效应”和“润滑剂效应”。东艳和马盈盈（2020）利用局部均衡的假设抽取方法，对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经济效应进行量化，认为中长期亚太价值链将呈现简单化和国内化的发展趋势。郑建明等（2020）分析得出，中美贸易博弈改变了 GVC 发展趋

势,中美价值链冲突影响GVC高端走向,贸易摩擦增强价值链环境的不确定性,以上因素是中国在GVC重构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上述研究是对外部环境对GVC结构性变化的重要作用的有益思考,但是并未系统地揭示GVC重构与大国博弈、贸易冲突之间的内在关联,关于地缘政治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直接证据有所不足,这给本文提供一定的研究空间。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系统剖析GVC重构、大国博弈、贸易冲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大国博弈和贸易冲突双重维度进一步解读GVC重构动力,并对其长期发展方向与特点做出前瞻性预判。对GVC开始和加速重构动力的区分与辨析,有助于明晰新形势下对GVC重构的再认识,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从外部动力视角研究GVC重构的内涵;同时丰富了有关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启示国家的战略决策及国际关系维护应该兼顾对上下游经济体及GVC节点位置变动的影响,对后疫情时代中国把握GVC重构机遇、应对潜在风险挑战、破解“低端锁定”困境等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如下:第三部分厘清GVC重构与贸易冲突、大国博弈三者之间的耦合机制;第四部分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视角下探究GVC加速重构的动力;第五部分对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背景下GVC重构的新方向做出研判;第六部分结合全文主要结论提出中国的应对思路。

三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贸易冲突、大国博弈的耦合机制

(一) 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成为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反作用力

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表现为GVC的深化演变。GVC不断扩张得益于以下几点:跨境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全球技术落差持续扩大,多边贸易规则和体系不断完善导致贸易和投资壁垒减弱。上述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从长期来看仍然能够成立,基于分工深化、比较优势的GVC扩张依旧会持续。但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与大国冲突加剧、疫情全球肆虐等多种因素叠加，使以往具有正向动力的拉动GVC扩张的因素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作用方式和效果，部分要素的跨境流动在合作时代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但在竞争时代则初现政治驱动属性，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可能演变成GVC扩张的反作用力。具体来说，在GVC分工体系之下，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焦点从传统的最终产品转向GVC的技术高点和关键节点，GVC中的贸易政策和经贸规则成为大国竞争与博弈的新工具，由此引发的贸易冲突具有常态化、复杂化、全局性的特征。例如，美国为实现大国博弈战略目标，试图凭借对GVC关键节点的把控和中心枢纽位置优势，持续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GVC分工体系，这将导致全球经济分化为“二元结构”，即在向下游持续输出低技术含量产品、输入低价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同时，封锁管制上游高端核心技术溢出，遏制战略竞争对手发展，既享受GVC分工带来的经济红利又实现将后发国家“低端锁定”的目的。这种“双层构造”战略势必引发他国的贸易抵制与政治反对，进而重塑未来地缘政治经济版图，合力推动GVC的解构和重构。

（二）制度性贸易冲突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结构性重塑过程

根据价值链分工理论，不同环节的增加值收益存在非均衡性。处于创新研发环节的价值链上游链主国家往往从价值链分工中获取的附加值最大，处于加工组装环节的下游经济体则获益最少（程大中，2015），由此产生了GVC不同地位参与者对于国际分工格局的不满和附加值利益的争夺，这种争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逐渐演化为贸易摩擦与冲突，并从以下两方面得以强化：一方面，美欧等链主国家为垄断GVC增加值，企图利用价值链议价权制定体现自身意志的贸易规则和作出排他性制度安排，如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以“低端嵌入”方式参与GVC分工的经济体，随着在GVC中地位的跃迁和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提升，触及链主核心利益的可能性增加，改变了此前贸易互补格局。2011年“光伏”双反案标志着中美之间贸易竞争性增强，由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演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企业间的竞争和对抗日渐频繁（吕越等，2019）。根据全球贸易预警平台数据，2009

年之后,全球贸易保护性措施新增数量持续上涨,出口管制、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出口许可证限制等措施层出不穷,2021年各国政府制定的贸易保护性措施更是达到贸易自由化措施的6倍之多。贸易冲突成为地缘政治风险的外化形式与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并深度嵌入GVC,凸显出制度性摩擦的特征,极大动摇了GVC的原有布局基础,破坏了全球化时代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成果。因此,将GVC重构与贸易冲突、大国博弈相结合,建立全方位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 诸边联合博弈左右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与方向

主权国家政治的内顾与世界统一市场之间天然利益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底层逻辑的合理性,决定了地缘政治将持续动摇基于国际产业分工而产生的GVC的稳定性,但大国同时以GVC分工利益为依据动态调整国际关系,进而产生GVC布局结构性变化的后果。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由“接触”调整为“规锁”,中美关系遭遇断崖式恶化,“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支撑致使中美博弈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拜登上台之后,在延续前任政府在瓦森纳安排等多边机制下诉求管制物品的同时,逐步建立并主导各种民主联盟和科技联盟,并在联盟内部推动盟友在对华高科技产业的态度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将多边行动常态化,作为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武器,在美方之间以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为抓手筑起“小院高墙”,企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区域价值链、联盟价值链。未来美日欧多边联合与中国之间博弈将是影响GVC重构方向的重要变量。美国出台“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宣称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等联盟国家重组GVC,旨在减少对中国关键产品或战略产品的依赖。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大国长期竞争和博弈的不确定性及诱发风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GVC重构的进程。

(四) 全球价值链重构经由投入产出关联放大贸易冲突影响

GVC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多次跨境流转,最终产品的生产客观上将各环节参与主体进行复杂链式相连。发展中国家与传统工业化国家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全球采购浪潮形成重叠复杂的商业网络。一方面,一经济体

的贸易限制措施在对目标国进出口活动造成冲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贸易、投资、消费等渠道影响他国经济发展。例如,在GVC的分工模式之下,中美贸易争端也将波及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如东盟、韩国、日本及澳大利亚等经济体,进而严重冲击现有的GVC布局。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估算显示,倘若中国向美国出口下降10%,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将同向减少19.9%。另一方面,部分价值链参与主体所推动的GVC重构,一定程度上会基于投入产出关联影响上中下游参与主体。尽管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并且由于所处价值链环节的差异,参与主体所受影响具有非均衡性。地缘政治联动贸易冲突的影响范围远超直接关联的产业,针对任何经济体的贸易保护或限制措施均会沿着价值链上下游扩散至更广泛的贸易主体,对所有贸易伙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通过GVC的各个衔接环节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直接结果便是GVC在双边乃至多边的重构。

四 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视角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动力

(一) 全球价值链重构发轫之始的动力

1. 利益分配失衡加剧全球价值链选择性“脱钩”

封闭经济下,企业利润最大化活动促使就业、投资、消费在主权国家内部循环。GVC成为目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进一步割裂了企业和国家利益的良性衔接,企业利润作为资本和技术输出国家的经济增加值,但是所伴生的就业、投资、消费隐形经济收益被生产网络增值地获取。即在当前GVC的分工体系中,跨国公司逐利行为并未同步实现母国经济和战略收益的最大化,甚至因此激化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中美贸易争端就是这一现实的产物。同时,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部分要素拥有者并未切实分享到GVC分工的利益,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激化,为“逆全球化”创造了民意和政治基础,具体表现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美国以“美国优先”为政策出发点,重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摒弃多边贸易协议,“退群”事件频发,高举“公平贸易”大旗,在全球范

围内加征惩罚性关税,先后挑起与中国、墨西哥、印度、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争端,不仅加剧了全球局势的紧张程度,也进一步催化了GVC的“脱钩”与重构。

2. “制造业回流”推动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洼地”的活动引发全球生产的纵向一体化,GVC得以构建,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和投资大规模移出,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空心化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均未实现完全出清,产能过剩导致世界经济总量增速放缓,投资增速放缓尤为显著,同时全球市场需求极度萎靡,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跨国流通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引擎,拉动作用开始减弱。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动用产业政策,开启“制造业回流”重振本国实体经济,引导鼓励跨国公司回归本土。与此同时,将生产线贴近消费市场有利于根据需求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增加供给弹性,权衡之下,经济利益大于回迁成本的跨国公司开启回归本土计划,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由此导致全球经济的“本土化”“碎片化”发展,传统GVC分工模式产生割裂,全球生产缺口持续扩大,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GVC开始重构。

3. 全球贸易动力模式进入新旧转化通道

通过比较不同时间段GVC参与度变化率,发现2008~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GVC参与度均呈现明显下滑趋势。这是全球贸易动力模式进行新旧转换的深刻体现。一方面,跨国公司贸易动力从寻找“成本洼地”转向占据“需求高地”,全球需求的地理格局变化重塑GVC延伸模式。随着消费者对“品质”和“创新”的要求提高,企业不再仅仅追求成本优势,而是更加注重及时对弹性需求做出反应,地理空间上贴近最终市场的区位优势愈加凸显,加快跨国公司的生产决策从寻求效率的投资转向寻求市场的投资。另一方面,劳动套利导向的全球贸易投资逐渐向知识、资本套利转变。最具活力地区和行业的生产分散化逐渐成熟,劳动套利导向的贸易拉动式增长的成功模式面临潜在阻力;“机器换人”^①应用至制造业生产中的现象越

① “机器换人”是指以现代化、自动化的装备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新的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

来越普遍，全球范围内劳动力要素配置和流动的动力减弱，GVC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价值链向下游延伸的必要性降低，GVC呈现缩短的态势。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削弱廉价劳动力成本在公司营收中的贡献，强化了知识溢出环境、前沿集成技术的重要性，推动离岸外包向本土生产和近岸外包转变，价值链本土化、区域化属性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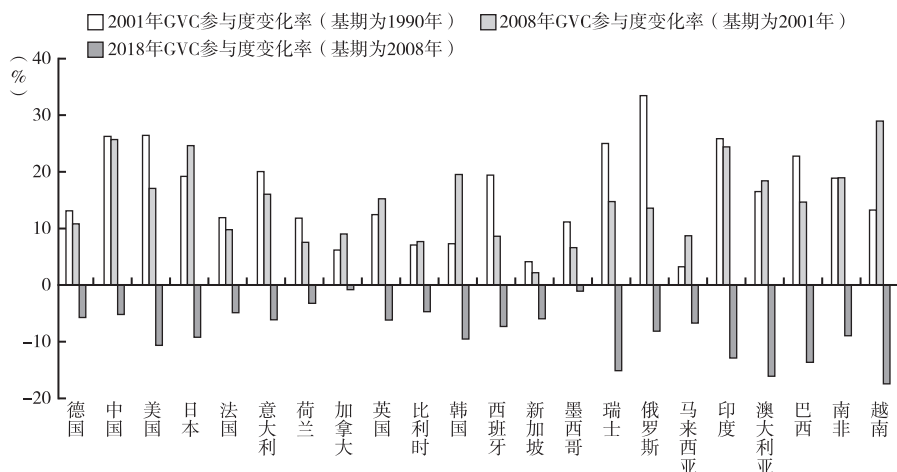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时间段全球主要经济体GVC参与度变化率比较

注：各经济体的排序依据2019年出口贸易额，按降序排列。经济体GVC参与度变化率=（本时间段内GVC平均参与度-上一时间段内GVC平均参与度）/上一时间段内GVC平均参与度×100%。

数据来源：笔者依据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数据计算所得。

（二）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新动力

1.效率优先让位，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成为跨国公司海外布局优先项

GVC体系下的高度分工不可避免扩大了风险敞口，加之全球整体不确定性上升，保障本国基础产业运行和关键资源的生产供给愈发受到重视。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得各国客观意识到，过分依赖外部供应难以抵御GVC断链风险，有损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构建完整闭合的国内供应链、加强对上下游环节的控制成为未来的战略重点。在大国博弈和国家安全泛化诉求的指引之下，效率优先作为GVC分工的首要目标逐渐让位，安全、稳定、可靠、遏制竞争对手成为链主产业与贸易政策的优先

选项。着手结构性、策略性拆解原有GVC环节,将推动GVC从全球网络嵌入式向松散、碎片链接式演进,构建并加入区域价值链成为多数国家的折中策略。目前已有部分经济体制定了限制本国跨国公司境外经营范围或为海外企业报销回迁费用的政策,以保证国内关键产业链供应安全,GVC版图加速重塑。从企业层面来看,后疫情时代,跨国公司对GVC布局的考量逐渐从“成本与效率优先”向“效率与安全并重”转变(宏结和钟晓欢,2020),东道国产品供应的相对稳定和面对外部冲击所展现出的韧性愈发成为跨国公司海外布局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直接影响GVC中下游参与经济体,能否继续分享GVC分工的红利,客观上使得GVC进入加速重构的通道。

2. 技术民族主义迅速壮大,技术型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特征

大国博弈实质上是对于技术制高点的争夺(王玉柱,2020),在GVC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的时代,则直接表现为对关键技术供应链的争夺。对竞争对手的政策规锁和贸易冲突在GVC分工体系下共同显性化为链主国家技术民族主义^①,即企图通过技术断供和管控形成新的全球性技术闭环,并在数字规则话语权争夺和摩尔定律的加持下呈现极化趋势。疫情使以美国为首的链主国家深刻意识到在GVC中对于中国的严重依赖,加之中国企业近年来在GVC上不断攀升的现实,技术民族主义潮流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目前,强化技术投资与并购审查、发起以技术转让为重点的贸易调查、强化单边技术出口管制、推动构建技术出口管制的多边体系皆是技术民族主义渗透GVC分工的表现(余南平和戢仕铭,2021)。美国作为“链主”国家,凭借对GVC的动议权和控制权,高举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大旗,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旨在关闭中国通过GVC获取外向技术溢出的“干中学”通道。美国发动“301”调查,对中国输美5000多亿元商品加征四轮惩罚性关税、出台《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加强对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管制、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包括华为在内的

① 技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在于秉持技术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原则,强调核心技术必须由民族企业所垄断和掌握,以此实现打压、围堵他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目的,强化自身在GVC分工体系之下的竞争优势。

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技术封锁、在《无尽前沿法案》中6次提及中国，把中国视为当前全球科技角力中最主要的手、发布《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宣布美国将继续加强技术管控、强化结盟遏制。中美半导体与芯片之争已经成为两国在高科技领域斗争和大国竞争的缩影。在过去30年所形成的GVC具有高度分工、上下协作的特征，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寻找竞争优势单元来达到最优的效率和生产力，实现关键的可持续价值创造。然而技术民族主义的抬头与盛行，一方面使得GVC上下游参与主体的不对称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另一方面，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将会展现出常态化、复杂化的特征，GVC延伸和升级的难度加大。

3. 从近岸转向友岸外包，公平贸易与价值观贸易日渐盛行

GVC的广泛发展得益于各国对自由贸易理念的认同与践行。而大国博弈与贸易冲突的交织致使自由贸易屡屡受挫，以美国为首的链主国家高举公平贸易与价值观贸易的大旗，组建特定问题联盟，奉行“在岸生产”和“友岸外包”策略，重建自主、可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推动GVC加速重构。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存在不公平现象，授权贸易代表审查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等高精尖领域，并于2018年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拜登政府强化奥巴马时期以“非市场经济地位”为抓手，推进“政策规锁”中国的战略构想，试图渗透民主价值观，以“利益政治+原则政治”为导向，通过重塑价值链分工规则，建立“价值观联盟”^①，用武器化和政治化的非中性原则将中国锁定在GVC低端，构建平行体系将中国隔离在主流圈层之外，强行改变由市场自发力量驱动的全球产业分工布局。民主科技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区域贸易、联盟贸易，加固了“北北”合作模式，复杂的GVC被限定于人

① 泛指链主国家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而形成的非约束性的联盟体系。202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集体出席全球新兴技术峰会（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y Summit）。在会上，他们大段谈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和模式之争，要求美国和盟友确保科技价值观和规则一致，做出“民主国家的抉择”。

为或政治指定的地理区域内, GVC空间布局呈现碎片化趋势。俄乌冲突更是客观上强化了美国主导的价值观联盟, 未来中俄关系会作为新议题, 成为美国联合制裁中国的新借口。在GVC区域化特征愈发凸显的时代, 美国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抢占亚太地区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 加强对华半导体技术围堵, 推动构筑亚太地区排华供应链网络。同时, 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磋商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4), 对内技术闭环交流, 对外技术排他性封锁。在《芯片与科学法案》和CHIP4的相互加持下, 美国不仅直接封锁输出中国的半导体科技通道, 同时间接限制日韩高端半导体技术外溢, 进一步围堵中国通过区域大市场的多元化半导体技术引进路径。

五 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方向

(一) 主动需求协同被动应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愈加泛化

GVC最初开始重构时, 内在动力更多源于主动需求, 即链主国家为维持GVC的议价权与利益分配地位, 新兴经济体为摆脱“低端锁定”困局, 实现价值链攀升, 主动推进GVC的重构, 其动力、原因、演化方向较为单一, 外部性因素的作用力相对有限, 要素禀赋、技术变革等内生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 全球生产一体化搭建了经济发展的“自动扶梯”, 在终端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产业转移的双向拉动下搭上外贸发展的便车。一国分工地位的“点动”必然带来GVC网络的“联动”, 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变化在GVC网络体系下的影响并非单向的, 而是一种网络化、多维度、嵌入式的辐射集合(余南平和廖盟, 2023)。疫情叠加中美贸易争端等因素致使GVC加速重构后, 主动需求和被动应对共同成为GVC重构的驱动因素, 价值观联盟之下的其他经济体被迫卷入GVC重构趋势之中, 其他国家为求继续享受GVC红利被迫选边站队。与此同时, 其内在逻辑、动力因素、发展方向则更加复杂化, 贸易冲突与大国博弈等外部性因素的作用被放大, 尤其是加入了人权、泛安全化、海外反腐等聚焦点, 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GVC加速重构的方向和进程。

（二）全球价值链非市场变化凸显主权化趋向

GVC分工在加强各国经贸联系的同时，也加剧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张彦，2020），为各GVC参与国的利益争夺提供动力基础，并集中表现为大国博弈和贸易冲突。与此同时，GVC的布局和延伸成为大国竞逐的方式和依托，主权国家对GVC进行干预性介入和强力性重构，尤其是美国维护全球“经济霸权”的战略诉求与GVC结构性变革交叠渗透，以及全球在“经济自主”思维下强化经济安全与追求经济权力的方向性转变，进而偏移甚至是取代市场导向的贸易往来与投资活动，违背效率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的分工原则，造成贸易增加值和社会福祉受损。大国战略博弈与地缘政治升温引发全球供应链出现以主权化为特征的结构性变化，违背市场原则的非理性行为日渐盛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区域贸易协定作为降低关税和投资壁垒的制度安排，不仅是GVC区域化属性的深刻体现，而且可以广泛降低双边及多边贸易成本。但近年来“退群”事件频发，可能导致贸易协定的中断和贸易条件的变化，限制企业的市场准入和贸易机会，迫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结构，寻找新的市场和合作伙伴，引发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和法规，承担更大的贸易风险。第二，一些主权国家采取了限制外资和市场准入的措施，可能导致GVC上下游环节的延伸受到制约，使得企业无法自由选择最优的生产地点与合作伙伴。第三，主权国家越来越注重保护关键技术和核心产业，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可能导致在GVC中的一些环节出现重叠或重复投资，违背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原则。第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施行“中国+1”的保守投资策略，即以增加成本、损失效率的方式对冲潜在风险，谨防供应断链风险，增加市场需求的弹性应对。GVC趋于主权化的调整方向不仅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问题，同时还可能损害和瓦解全球化过程中既有经济联系的基础，加剧全球经济不稳定背景下的高强度政治博弈与地缘政治冲突。

（三）自主创新成为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因素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单纯依靠嵌入GVC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会陷入“低端锁定”泥沼（刘志彪，2019），大规模、持续技术创新是打破

这种桎梏的必然要件。一般来说,技术创新包括自主创新和技术溢出两种路径(张茉楠,2020),但受制于此起彼伏的贸易摩擦和日渐强化的出口管制,经由GVC获取技术逆向溢出和多元技术引进的难度加大。出于大国战略竞争目的,在“链主”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下,处于GVC上游技术研发环节的公司会将核心技术提前“解构”(诸竹君等,2020),有计划地分散和隐蔽完整技术链条,从而使得GVC下游国家只能参与单一环节的生产。当位于GVC中下游的国家试图借助逆向技术溢出以实现GVC攀升时,较易招致“链主”国家的策略性制裁,达到将其牢牢锁定于GVC低端的目的。因此,在GVC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GVC攀升的主要驱动因素。然而通过自主创新以推进GVC攀升又可能导致与“链主”国家的GVC发生利益重叠,进而加剧贸易冲突(余振等,2018)。这意味着未来新兴经济体价值链位置的动态跃迁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阻力。

六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的政策选择

(一) 贯彻落实创新立国战略,以产业升级迎接全球价值链重构

创新是助力价值链攀升、改变GVC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应对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升温的制胜关键。后疫情时代,贸易动力模式的转换和技术断供与管制引发的贸易冲突推动GVC呈现“技术密集化”的重构趋势,叠加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自主创新成为结构性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来说,应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集中力量进行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战略装备等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加快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抢占数字创新领域高地。以创新链提升产业链,支持主要产业集群和中心城市加快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构建世界水平创新平台和增长极。利用市场需求驱动的本土企业创新升级。一方面,通过超大国内市场规模加快推动本土核心技术创新、优化工艺流程、树立全球品牌,创造、引领、满足人们多层次、广领域的美好生活需求,实现市场需求与生产革新的良性互动循环,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另一方面,坚持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的策略,把握跨国公司海外布局愈发重视用户的需求,向消费市场转移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等活动的宝贵机遇,推动海外研发中心落户,促进与本土企业合资合作,充分利用知识溢出效应,通过“集聚效应”“竞争效应”倒逼本土企业加大创新力度,从而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二) 加快形成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体系

对价值链的稳定控制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占据GVC高端地位的原因之一,关键在于其完善的供应链安全体系的保障。2012年,美国率先制定《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国家战略》,并每年出台《国家供应链竞争力报告》。未来,大国博弈、贸易冲突为GVC参与和布局增添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安全目标成为跨国公司海外布局的优先选项。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总体安全观思想的指导之下,将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经济安全范畴,加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体系顶层设计。首先,厘清中美之间竞争属性大于合作属性的产品和GVC上地位接近或重叠的关键环节,警惕美方以此为据发起贸易争端和采取措施制裁相关企业的风险。其次,及时监测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要素供应链安全,尤其是有“卡脖子”风险的环节,如高附加值化学药品、特种化学制剂、半导体材料、集成电路,以及严重依赖外国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资源。最后,多元化供应链来源,减少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依赖,建立自主可控弹性供应链,增强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能力,建立健全供应商评估和选择机制,提高供应链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三)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联动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

地缘政治升温,贸易冲突频发,全球化遭遇强大逆流,并不意味着GVC分工就此走下历史舞台,各国重回封闭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生产专业化和贸易多边化的底层逻辑依旧成立,我们应更多地从区域局部大循环来理解这种现象。因此,一方面,中国应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多边合作。在技术民族主义、价值观贸易日渐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拓展与欧盟的合作空间,建立常态化的对话机制,广泛增进合作共识,有效抗衡与应对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利用好进出口两面市场和超

大市场砝码,与主流国家加强交流,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坚持奉行积极扩大进口战略,特别是扩大东亚邻国进口规模,广泛提升吸引力经济权力,增强中国超大市场对跨国公司的黏性,一定程度上对冲与缓解美国拉拢亚太盟友与建立亚洲排华供应链的企图,强化中国在东亚供应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模式应朝着“以国内需求带动国际贸易”与“以国内生产为主轴构建区域产业循环”等方向调整,推进以GVC为重点的区域经贸以及投资协定,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利用经济互补红利,建立紧密稳固的区域经济循环体系。

参考文献

- [1] 保建云、李俊良,2022,《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与中国的政策选择》,《国际经贸探索》第7期。
- [2] 程大中,2015,《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经济研究》第9期。
- [3] 戴翔,2020,《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中国机遇及对策》,《经济纵横》第6期。
- [4] 戴翔、宋婕,2019,《“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重构全球价值链吗》,《世界经济研究》第11期。
- [5] 东艳、马盈盈,2020,《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与亚太价值链重构——基于假设抽取法的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6] 樊海潮、张丽娜,2018,《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 [7] 何宇、张建华、陈珍珍,2020,《贸易冲突与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 [8] 宏结、钟晓欢,2020,《新冠疫情叠加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新动向研究》,《国际贸易》第9期。
- [9] 林桂军、何武,2015,《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及升级趋势》,《国际

贸易问题》第4期。

- [10] 刘志彪, 2019, 《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家》第12期。
- [11] 卢潇潇、梁颖, 2020,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中国经济问题》第1期。
- [12] 吕越、马嘉林、田琳, 2019, 《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中国方案》, 《国际贸易》第8期。
- [13] 毛蕴诗, 2017, 《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升级理论与实践》,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4] 倪红福, 2020, 《全球价值链中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及结构: 理论与实证》, 《经济研究》第10期。
- [15] 邵朝对、李坤望、苏丹妮, 2018, 《国内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周期协同: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第3期。
- [16] 世界贸易组织, 2019,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gvc_dev_report_2019_e.pdf。
- [17] 苏丹妮、盛斌、邵朝对、陈帅, 2020, 《全球价值链、本地化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效应》, 《经济研究》第3期。
- [18] 苏庆义、高凌云, 2015,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其演进规律》, 《统计研究》第12期。
- [19] 谭人友、葛顺奇、刘晨, 2016,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竞争格局——基于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世界经济研究》第5期。
- [20] 王玉柱, 2020, 《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兼论大国政治驱动的新区域主义》, 《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
- [21] 徐奇渊, 2021, 《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的选择》, 《金融论坛》第8期。
- [22] 余南平、戢仕铭, 2021, 《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以全球半导体产业为例》, 《国际展望》第1期。
- [23] 余南平、廖盟, 2023,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家产业政策——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 《美国研究》第2期。
- [24] 余南平、栾心蔚, 2023, 《结构性权力视角下的大国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国际展望》第3期。
- [25] 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王梓楠, 2018, 《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 [26] 张茉楠, 2020, 《博弈——全球价值链变革下的中国机遇与挑战》,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7] 张威、李丹、卫平东, 2022, 《地缘风险、不确定性与深化RCEP贸易合作的中国

- 策略》，《国际贸易》第7期。
- [28] 张彦，2020，《RCEP区域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政策选择——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亚太经济》第5期。
- [29] 郑建明、杨策、王万军，2020，《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视角》，《国际贸易》第9期。
- [30] 诸竹君、黄先海、王毅，2020，《外资进入与中国式创新双低困境破解》，《经济研究》第5期。
- [31] 竺彩华，刘让群，2021，《中美博弈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太平洋学报》第4期。
- [32] Baldwin R., Venables A. J. 2010. “Relocating the Value Chain: Off-shoring 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16611.
- [33] Henry F., Abraham L. N. 2019.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42-79.
- [34]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2014.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2):459-494.
- [35] Michael P. 1988. *Competitive Advantage*.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Inc.
- [36] Milberg W., Winkler D. E. 2010. *Trade Crisis and Recovery: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Inc.

(责任编辑: 许雪晨)

Table of Contents & Summaries

Research on the Emerging Trends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Geopolitics and Trade Conflict

HONG Jie¹ ZHONG Xiaohuan²

(1.School of Busines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ummary: The current global value chain (GVC) restructuring process has been accelerated by the overlapping factor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U.S. - China trade dispute, an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is further highlights the global and urgent nature of trade conflicts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in GVC restructuring.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literature that examines the global value chain from an external dynamics perspective. In this regard,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intrinsic linkages among geopolitics, trade conflicts, and GVC restructuring. It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evolutionary direction of GVC restructuring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geopolitics and trade conflicts, leading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have deeply embedded themselves within the GVC, where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power games shape the process and direction of GVC restructuring. GVC restructuring magnifies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rade conflicts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through input-output linkages. Secondly,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exacerbates the selective “decoupling” and “reshoring” of GVC, driving the reorganiz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rules and the transition of trade dynamics. Geopolitical risks,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normalization of technology-related trade frictions, and prevailing concerns about fair trade and values serve as catalysts for accelerating GVC restructuring. Looking ahead, proactive demand coordination and reactive responses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generalized nature of GVC restructuring, highlighting the trend of sovereign-oriente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non-market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ll become a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GVC advancement. In conclusion, China shoul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indigenous co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the vast domestic market scale, adopt a market-oriented approach to attract “reverse innovation,”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ecurity system for value chains, industrial chains, and supply chains, make good use of the dual-sided market of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enhance communication with mainstream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it should strengthen imports from East Asian countries to prev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ast Asian supply chains that exclude China. Furthermore, it should deepen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utilize existing regional agreements effectivel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establish high-standard regional agreement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research connotation of GVC restructuring from an external dynamic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policy insight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and overcoming the “low-end lock-in” dilemma.

Keywords: GVC Reconfiguration; Great Power Game; Trade Conflict; “Low End Lock-in”

JEL Classification: F150; F18; F41